

中国最早的图书馆是如何被发现的

□ 乔琍文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众多经典中，他对《庄子》有较多的引用阐发，并曾引用“褚小者不可以怀大，铤短者不可以汲深”告诫共产党人要开阔眼界、储备知识、提高能力，克服“本领恐慌”的问题。

“褚小者不可以怀大”，唐代成玄英疏解为“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意思是小的器皿里盛不下大物件。孔子就曾指责管仲“器小哉”，在世人眼中，管仲有“九合诸侯”的功劳，然而在孔子看来管仲不知俭，不知礼，囿于一己之私欲，未能真正匡正天下，导致天下复归于乱世，夫子痛心疾首。那管仲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有救世之情而未书于君子之大道也。”君子之大道也就是孔子在《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实现“天下为公”，则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不为利禄而进，不为得失而退，竭尽心力。

可是，乱世春秋，行大道者几希。战国时期的士人游走列国，常常为了自己的功业，心慕力追，不问计策良善。《史记》记载，商鞅曾三次向秦孝公兜售自己的治国方略，第一次以五帝天下为公之道劝说，无功而返；第二次以三王德治之道进谏，失败而归；第三次索性改说春秋五霸之道迎合秦孝公，获得青睐，终成秦国的座上宾。然而，商鞅心知肚明，以霸道治国难以企及三代之治，究其原因，是“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历史也证明了，商鞅变法尽管成就了秦帝国的一统辉煌，却也造就了国祚短促。所以司马迁对于商鞅的评价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划天下为九州，并制定九章大法来治理社会。所以《易·系辞》里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表达了中华先民对知识的尊崇。目前发现的有考古证据证实的中国最早的图书和图书馆，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典册和“龟室”。说起来，这个中国最早图书馆的发现，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一个相关专家学者接力探索的故事。

清朝末年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国子监祭酒总管全国的教育工作，王懿荣执掌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多年，曾经3次担任国子监祭酒，是一位名闻朝野的饱学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学造诣。《清史稿》里特别提到：“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的收藏界，王懿荣享有“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的声望和影响力。在1899年，也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前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懿荣发现药店卖的“龙骨”——也就是龟甲兽骨上刻着一些奇怪的字符，出于一个金石学家的学术敏感性，王懿荣“见之狂喜”，认为这些字很值得研究。于是，他让家人大量收购药店里的“龙骨”，拿回家认真研究。由于刻在龟甲上的痕迹与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处，深通金石文字、有着丰厚知识储备的王懿荣，很快就认出了龟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种文字。因为碰到了王懿荣，龟甲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研究资料，避免了人为的继续毁灭。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王懿荣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他不仅是一位大文学家，而且精通算学、医学、金石等各种学问。1900年，王懿荣因为抗击八国联军而以身殉国。王懿荣去世后，刘鹗就把王懿荣收藏的刻有文字的甲骨文物大部分都买了下来，同时继续收集。1903年，刘鹗从他收藏的甲骨中精选了1058片，石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因为刘鹗字铁云，所以这部著作取名为《铁云藏龟》，刘鹗也成为第一个确认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并说出根据的人。《铁云藏龟》的出版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收藏变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公开资料。

为《铁云藏龟》作序的罗振玉

罗振玉是刘鹗的好朋友，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他在发现殷墟甲骨这件事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是著名的“甲骨四

堂”之一。罗振玉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是在刘鹗家里。一见之下，大为震惊，他看出甲骨上的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并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因此，他一方面鼓励刘鹗把拓印的甲骨文整理出书，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甲骨的出处。当时，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大多隐瞒甲骨真正的出土地。罗振玉经多方打听，终于探知甲骨真正的出处其实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然后，他亲赴安阳，成为来到小屯村实地考察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在安阳小屯村考察之后，罗振玉确定小屯村就是《史记》中提到的“殷墟”，也就是商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并直接导致了后来殷墟的发掘。罗振玉考释出甲骨文单字近500个，大大促进了对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的研究。中国文字博物馆2016年曾面向社会发出“悬赏令”：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10万元，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考释出一个字，拿到了这个10万元奖励。可见考释甲骨文单字的难度之高。如果放在今天，罗振玉能拿一大笔奖金呢！

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与罗振玉关系密切，是学生、朋友，还是儿女亲家，在甲骨文研究中二人共创“罗王之学”，都名列“甲骨四堂”，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板块的黏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这大大提高了甲骨文辨识和研究的效果。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创造了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把中国有文字可考又有实物证据支持的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

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及蔡元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

董作宾也是著名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文学门做研究生时，王国维是董作宾的“远程指导教师”，通过书信交流进行指导。前面四位专家的研究和发现使得一片甲骨惊天下，一时轰动世界。一开始，安阳小屯村的村民不知道甲骨的价值，他们把偶尔挖到的甲骨当作药材卖给了药店，当时每斤价格只有几文钱。有字的甲骨，上面的字大多还要被刮掉。但是自从王懿荣、刘鹗等人发现甲骨的价值以来，甲骨的价格暴涨，文物贩子和许多听说这件事的人甚至是外国人都开始大量盗掘殷墟遗址的甲骨，给殷墟文物造成重大损失。无奈当时中国正处在兵荒马乱的时期，

政府无暇管殷墟。上世纪20年代时，作为河南南阳人的董作宾在回乡调查了解到这些情况，心急如焚，向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提交了报告书，汇报了殷墟盗掘的状况，指出殷墟之下还有甲骨，急需当局组织科学发掘。正是这一报告，开启了系统发掘殷墟遗址的道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看到报告后，立即批准，安排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村发掘。当时的史语所由傅斯年担任所长，傅斯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对殷墟考古工作高度重视，提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和梁启超的儿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带领考古组来到殷墟主持规范的发掘，盗掘情况才有所好转。

但是考古工作依然困难重重：一开始可能由于迷信的缘故，当地有些老百姓阻挠发掘，甚至强制逼停发掘工作。傅斯年就亲到河南开封，把各方面关系疏通理顺了，发掘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1936年春季，考古组第13次进行殷墟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始，一直没有什么发现，考古队原本计划在6月13日这天停工，等到天气凉爽后再开工。没想到停工前一天却有了重大发现：6月12日下午，考古队在小屯村北清理最后一个编号为“YH127”的窖穴，谁也不曾想到一铲竟挖出了惊天巨现！这个窖穴直径将近两米，挖下去半米以后，几片完整的大片龟甲一片接一片地呈现出来。这是一处从未被扰动过的甲骨堆积层。在这个窖穴内，共出土17096片甲骨，这些甲骨多数是整版的，刻满字迹，有朱书的，也有墨书的。“YH127”号甲骨窖穴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个。

这次甲骨出土震惊了世界，一万多片甲骨刻有文字，而且是分门别类有规律的摆放。所以，“YH127”号甲骨窖穴被认为是“殷人保存典籍的府库”。随着挖掘的深入进行，专家们发现在殷墟官殿宗庙遗址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甲骨窖穴。甲骨窖穴群所出的甲骨刻辞内容宏富，涉及殷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真实传递了上古中国的文明密码，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图书馆加档案库”。有些甲骨上面有小孔，几片一组整齐排列，可见当初是有绳子串联起来的。有一片上面还有“册六”的字样。可见当时就已经有了对这些典籍的分类管理。这充分证明了《尚书》所记载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和《史记》所说的“高庙中有龟室”是真实可信的。所以“龟室”也可以说是目前所知的中国古代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最早的称呼。

龟室的发现，充分证明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有了官府藏书和对这些藏书的管理活动。换句话说，中国藏书或图书馆有据可查的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

《神奇秘谱》：中国琴曲专集的典范

□ 王志强

明代初年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部流传至今的古琴曲集，也是我国历史上保存古代音乐作品史料价值最高的琴曲集。朱权从历史上数千首琴谱中精中选精，挑选出了64首曲谱，其中就包括《广陵散》《遁世操》等名曲，从而编纂成书。

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被封于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故称宁王。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成功后，为防范藩王，将朱权软封在南昌。

朱权到了江西后，关心当地的民生发展，特意写了《豫章三害》戏剧，深切表达了自己对于时事政务的看法。三害，源自晋代周处的典故。周处年轻时横行乡里，侵害百姓，百姓对其痛恨不已，将他 and 南山虎、长桥蛟合称为“三害”。不仅如此，朱权还时常去询问百姓疾苦，向江西的官员提出自己的建议，竭力去改变江西的社会生态环境。

虽然好景不长，朱权稳固了权位后，继续开始削藩政策。为了躲避政治的倾轧，朱权倾心于学术，开始著书立说，《四库未收书提要》称他“博古好学，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著述之富，一时无有及者”。清闲下来的朱权，兴趣非常广泛，他热心于剧作，著有《冲漠子独步大罗天》《淮南王白日飞升》《瑶天笙鹤》等剧本。他还鼓励文化发展，支持书籍刊刻，只要是有关教化的书籍，他都愿意资助作者刊刻发行。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朱权在音乐上面有很高的天赋和贡献，他作有戏曲《太和正音谱》，著有琴曲集《神奇秘谱》《琴阮启蒙》。《神奇秘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该书荟萃了历代琴谱的精华，在中国琴谱史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后世琴集的典范之作。

《神奇秘谱》全书共分为3卷。其中上卷为《太古神品》，收有16首作品；《太和正音谱》，著有琴曲集《神奇秘谱》《琴阮启蒙》。《神奇秘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该书荟萃了历代琴谱的精华，在中国琴谱史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后世琴集的典范之作。

《神奇秘谱》的内容大致可以分

为四类，第一类是人物故事，即通过历史人物或者故事传说，表达作者的喜怒哀乐，如惋惜项羽英雄末路的《楚歌》；第二类是自然景物，即通过描绘山水花鸟等自然景物，营造出意味隽永的艺术环境，如传达水光云影的《潇湘水云》、清傲高洁的《梅花三弄》；第三类是隐逸怀古，即表达自己对世俗的不满，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如《山中思友人》《樵歌》就体现了这种思想；第四类是哲理神话，即记述先秦时期道家诸子哲学思想的作品，《庄周梦蝶》《列子御风》就是这一类的代表。

在多数曲谱的前面，朱权都写有小序，不但详细标明了该谱的段落、指法、音位等内容，也展示了朱权的音乐美学思想。

《神奇秘谱》的美学思想，首先就是崇雅斥俗。在朱权的认知中，琴是圣人之制，是治理国家的帮手，是移风易俗的良方。他多次表示，他编纂《神奇秘谱》，就是为了感化人心，再现圣人之治，因此他的音乐观中有很强烈的存正声、去邪俗，坚守中正平和之音的一面。

其次，《神奇秘谱》还主张清新浪远的美学风格。我国古琴的音色以淡雅为主，琴音应指而响，多是冷冷然而涓涓然。表现在《神奇秘谱》中，就是对清高旷逸意境的追求。对宁静淡泊美学的追求，《太古神品》中的《遁世操》《招隐》等曲目，所展现的长生逍遥、道心寄物、修真养生等内容，就表现了传统中国“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意趣，展现了与污浊尘世相隔绝的隐居理想。

最后，《神奇秘谱》还展现了清深悲切的美学。我国的文人因时代的限制，常有怀才不遇之感，他们在现实社会中遭遇不平，满怀悲愤却又无处诉说，这种情绪融化于琴曲中，便形成了一种悲切之美。《神奇秘谱》所塑造的悲切，悲而不伤，但又不至于绝望，而是柔韧有度、刚柔相济，这就形成了古琴回环反复、含蓄曲折、一唱三叹的意味。

《神奇秘谱》表达了编纂者古雅清淡、洒脱超逸的精神追求，集中体现了传统的古琴美学思想。它是古琴艺术的重要成就和重要记录，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影响深远。

历史文化典籍



□ 郭代杰

褚小者不可以怀大，铤短者不可以汲深

在《史记》中，类似的“投机分子”还有不少，如苏秦初入秦国时，意气风发、口若悬河，意图以连横之策游说秦惠王，但却惨遭拒绝。一年之后，他再次复出，并将目标转向东方六国。凭借着对天下各国实力的分析，苏秦提出合纵抗秦的主张，进而一跃成为纵约长，佩六国相印。荀子就曾以“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批驳苏秦，他认为苏秦只是会些阿谀奉承的小道，懂得博取君主宠幸末技的“态臣”而已，以此来否定苏秦的行径，荀子更是作出结论：“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相较于荀子，孟子以“天爵”与“人爵”的概念肯定了君子的操守，“天爵”即是“四端”，“人爵”即是权力。在孟子看来，世人往往是“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只有君子具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精神，持续涵养着“大丈夫”品格与天下情怀。

因此儒家向来强调君子要“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尚书》记载，当周成王消灭淮夷返回王都后，与群臣共商国是，周成王感慨道，“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意思是周王朝之所以现在取得了丰功伟业，

正是因为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有着宏远的志向，兢兢业业地处理公务，少了些蝇营狗苟之辈。孟子有言，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人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重重磨炼成就伟业，正是因为他们有着远大的理想和仰之弥高的道德境界。

无大志者不足以成大事，成大事者必先立志。明代王阳明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他自幼就有成圣之志，11岁的时候向学于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唯有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思虑再三，反驳老师，他认为做官不能算是人生第一等事，唯有读书做圣贤才是。老师听后目瞪口呆，惊奇不已。之后成为人师的王阳明，依然十分重视立志，每每有弟子登门求教，他必先令其“立个必为圣人之心志”。有同样胸怀的还有孙中山，他说过：“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毛泽东更是在青年时代就立下远大的志向：“要趁年轻时学好本领，将来为国立功，为民造福。”

“铤短者不可以汲深”，荀子解释

道：“短铤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铤就是绳子，绳子短就打不到深井中的水，无知的人就不能了解圣人的言论，这句话就是劝诫后人要读书尚学、增强本领。钱穆曾说过：“器之容量有大小，心之容量亦有大小。识深则量大，识浅则量小，故人之胸襟度量在其识。”意思是器皿的容量有大小的规定，心的容纳度也有大小。学识深厚胸怀就大，学识浅薄胸怀就小，人的胸怀度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学识。

因此，“铤短汲深”，就要学以补之。中国传统文化也向来强调“学”的重要性，《论语》以《学而》为开篇，《荀子》以《劝学》为首篇，彰显了“重学”的思想。在《论语》中，子路曾向孔子求教：何必读书，然后为君子？孔子认为“学以成人”，必学而后为君子，学是实现人格理想境界的途径。那么如何实现学呢？孔子主张为学必读书。东吴名将吕蒙原本没什么学识，有一次孙权以光武帝刘秀手不释卷为例劝告吕蒙要多读书，才能更好地当涂掌事。吕蒙大为震动，开始每天读书，有一日，鲁肃找吕蒙商议大事，惊叹其非复吴下阿蒙。毛泽东就屡次引用《吕蒙传》劝诫党内干

部要多读书、多学习，“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年轻干部要把“勤学苦练、增强本领”作为练好内功、提升修养的重要方面，这是成为行家里手的关键。

“学海无涯”，就要持之以恒。习近平总书记曾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强调学习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是需要长期付出辛苦的过程，因此要养成坚持不懈的读书习惯，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日常生活态度、工作责任和精神追求。正如荀子所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毛泽东也曾以比喻的方式强调“学而不厌”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他认为我们的本领就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而领导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要持之以恒地学、走深走实地学，要始终保持“卖空”的危机感，养成“上新货”“进好货”的好习惯。

“学无定法”，就要掌握方法。韩

愈有云：“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绠”就是方法的意思，即求知要善读、要掌握学习方法，如果忽视这一点，往往造成事倍功半的后果。首先，韩愈指出博学多闻后要重“潜思”，因“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学习与思考、勤学与善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保证学习效果的关键所在。“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在学习的过程中，多问“为什么”，将思考贯穿学习的全过程。其次，学有所得后，要践履所学，学以致用，方能行稳致远，毛泽东曾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的目的不是为学而学，而是在于入耳入心，落实落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人如果不注重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落在行动上，即使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不能说达到了学习的最终目的。”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勤奋学习和增强本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习的深度决定了本领的高度。同时，学习的广度还影响着视野的宽度和思想境界的高度，“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我们身处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只有胸怀“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境界，砥砺“当时若不登高望，谁信东流海洋深”的进取精神，方能新的赶考路上勇毅前行。

中华文明智慧